

于坚文集·诗论集

诗歌之舌的硬与软

于坚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于坚文集·诗论集

诗歌之舌的硬与软

于坚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之舌的硬与软 / 于坚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4

(于坚文集. 诗论集)

ISBN 978-7-222-16848-0

I. ①诗… II. ①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7543号

责任编辑: 刘 焰 苏映华

装帧设计: 人合图文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诗歌之舌的硬与软 SHIGE ZHI SHE DE YING YU RUAN

于坚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ina.com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50千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978-7-222-16848-0

定价 48.00元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请与我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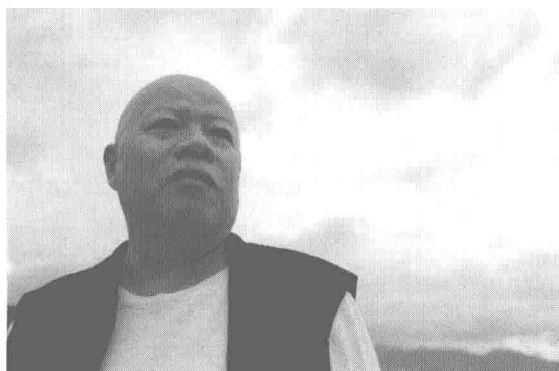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于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至今。著有诗集、散文集、随笔集、摄影集等，凡四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等奖项。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南联大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饶 卫 蒋永文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闻黎明 何伟全 张 玮

安学斌 刘 坚

编委会副主任：殷国聪 崔汝贤

编委：杨顺清 杨 洪 何 斌 陈 新

郑勤红 张绍宗 尚 云 李永明

殷国聪 崔汝贤 李红英 胡 彦

邹建达 包云燕 张曼菱 李光荣

谢 泳 谢本书 杨绍军 戴美政

吴宝璋 余 斌 朱端强 余嘉华

陈朝慧 杨立德 于 坚 海 男

朱 曦 高建国

目 录

新诗的发生 /	001
谈诗的制度 /	020
棕皮手记：诗如何在 /	041
这是一封信 /	086
还乡的可能性：从诗的蓝调开始 /	103
分 行 /	141
朗 诵 /	162
诗言体 /	176
棕皮手记·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 /	211
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 类语言向度 /	234

新诗的发生

100 年前，新诗发生了。

新诗不是一个诗内部的事件，而是一种文明进程。

新诗的发生与诗三百、律诗、词、曲等的发生不同，在新诗之前，诗的革命总是形式的改良，而新诗推翻那一切，诗在原始的意义上再次发生。无论形式，只是说出，招魂。诗重返文明的荒野，再次开始，就像诗第一次开始那样。“必也正名”，“礼失而求诸野”。

从诗经以降，诗的形式一再变化，但“道法自然”这一世界观从未动摇。“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所以旧世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充满魅力的世界。

人为何需要诗？这个问题在过去数千年中一直是不言自明的。“不学诗，无以言。”（孔子）

诗，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诗？成了一个问题，前所未有的。这个问题不独中国，它是一个世界之问。近代世界兴起的科学主义宣布并证明，世界可以不需要诗而存在。对于汉语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汉语是世界幸存的少数几种最古老的以诗性为根基的语言之一。

为什么需要诗？新诗的发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过往文明史上从未被提出过。

新诗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中国古老的、整一的“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动摇，日渐崩溃，“黑”隐匿，“无”退场，诸神垂死，万物不灵。“灵光消逝的时代。”（本雅明）现代世界的真理是祛魅。祛魅，一种功利主义的世界观，一种占有技术，怎么都行，只要有。

诗只在招魂这一根基上没有动摇。正是在这种混乱不明中，诗的存在作为一种本源的真理才终于彰显。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道法自然”与否，而在于人是否能够毫无诗意地生存。

消灭了黑，只有白。失去了无，只是“有”的世界依然是可在的世界吗？失去魅力的世界还是世界吗？野

蛮戴着物的面具登堂入室。人类正在一次次拜物的时髦中重返野蛮。诗当然必须跟着重返，它要回到洪荒去再次出场、招魂、布道。

与过往不同，诗现在必须为自己辩护。

孔子早就石破天惊地说出：仁者人也！仁就是诗意。人的出场是因为仁的觉醒。这是人之为人的根基。

不学诗，无以言！

郁郁乎文哉！

文是诗的迹象。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

这里指出的是一场远古的祭祀。诗就在这种祭祀中发生。

文是对这种祭祀的模仿、转移、记忆、保存和散布。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场，它的目的是招魂。文字将这个场转移到文中，是之谓文明。

无的在场通过文呈现。有无相生，知白守黑，诗守护着无。

孔子总结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迹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就是肯定、赞美（对存在、被抛入世界的感激）。观就是世界观、立场、解释（此在）。群，就是团结、沟通、共享。怨，就是批判、选择、否定。迹远，就是秩序、位、空间的确立和度的把握。多识就是知识。

这是宗教性的场，诗的到场就是祭祀的发生。诗教。巫师就是诗人。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在中国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巫术，一种语言的超度，与现代化的祛魅是完全冲突的。修辞立其诚。在中国，“经”一开始就被视为诗，诗是语言中的语言，最高的语言，诗是一种世俗的经。诗人在中国，就像印度的婆罗门，是某种神职人员。但不是世袭，诗歌天才通过经验、权威、人民心照不宣的感应得以遴选成为诸神在世的代言者。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称苏轼为佛。诗人最重要的标准是群，谪仙人神性的高度在于其诗篇与世俗世界的共享的范围、层次。

在别处，人们可以指着一座教堂或寺院说，教在那里。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只能指着文说，诗在那里。教堂、寺院倒塌消失，信者散去，诗还在那里。

诗的开始早于宗教。

文明，就是以文照亮黑暗。文的核心是诗。

道、灵魂、心灵、魅力、志、意义都是诗的场域不同的别称。

郁郁乎文哉！文是一种语言之教。

在世界历史上，社会变革从语言改造开始不乏先例。例如，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日本明治维新对日语的改造。汉语也是如此。

遵循着古老的真理，世界，无论事实还是精神，总是从语言开始。只有语言开始，世界才开始。对此，王阳明有过精彩的比喻：

“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个看是语言之看。世界被命名时，存在才存在。

新诗出现在汉语自诞生以来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在 20 世纪初，人们几乎已经失去了对这一具有七千年以上历史的古老语言的信任。在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看来，文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绞刑架。文人踊跃抛弃文投奔知识。

一百年前诞生的新诗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过去的朝代更迭，对语言的影响是缓慢的，语言是自然生长的。从 1840 年以来，语言巨变，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过往人们所熟知、所命名的世界已近黄昏，而一个崭新霸道的世界，正朝着中国逼来，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这个变局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或许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局，而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其实在根本上是一个文的变局。

充实之谓美（孟子）。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上，美总是第一位的，实用次之。但司马迁所谓的“虚美”也一直在威胁着美的地位。宋以后，诗日益成为语言游戏，修辞而不立其诚。文教衰弱，诸神隐匿。诗的形式逐渐固化为制度，就像印度婆罗门制度那样。格律的掌握成为一种文人准入制度。在传统中国的黄昏时代，虚美成为文的主流。与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文已经相去甚远。曾国藩说：“古文之道，无施不可，唯不宜于说理。”胡适痛斥：“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

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如果说，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那么汉语在过去五千年中，曾经为古典中国进行了辉煌的命名，这种命名的最高成就是诗。诗国对于中国不是溢美的形容词，而是存在。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对汉语这个故乡发生了怀疑、动摇。汉语试图搬家。新诗诞生的初衷是言文合一。将文的明、照亮，从文言文扩大到白话中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是“言文合一”。注意胡适说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已经意味深长地否定了像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那样的“大搬家”。世界上的社会变革，从语言开始的不乏先例，中国更是从文开始。胡适意识到“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19世纪以降，中国日益感到文言在命名现实时的无力。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西方作品的失败就是证明。文

已经难以活泼泼地“能指”了，强大坚固的隐喻系统使语言在新世纪面前成为名不副实的空转的陈言滥调，新世界不断产生的陌生意义令传统的意义系统摇摇欲坠、纷纷失效。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

如果在西方是上帝已死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已死。

从传统中国道法自然的风花雪月走向天翻地覆的现代社会，可能始料未及的不仅仅是重整山河，从国民性到生活方式、风俗的大拆迁，也是文化的重塑。过去五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局，他们或许经历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变迁，但是大地没有变迁，生活方式没有变迁，风俗不朽，文没有变迁。此时代经历的动荡变化是过去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局。

正如西方一句现代格言所说：“Past is another country.”（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必然也是另一种语言。在许多文明的例子中，新世

界的后果是，语言适应新世界并命名之，人们不再认识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在拼音语言中尤其明显。现代化是植根在拉丁语系中的运动，这种起源于商业目的的语言实用而精确，例如法语，物、主、性、数、格全部细俱。而汉语则相反，语词的含义是可以根据上下文随时变化的，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可以随意改变。朦胧、混沌，非常利于诗性的言说。

文雅中国温良恭谨让的汉语与强悍野蛮积极进取的现实名不副实，但是，汉语的本性决定它无法像拼音那样自我革命。这是汉语独一无二的伟大特性，它可以改良，但无法革命。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到来时，汉语力挽狂澜，没有走向拼音。

在中国，语言的运动必然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意义和精神方向的运动。西方语言学误导甚深，汉语从来不存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分。汉语的能指和所指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就是字，这与拼音语言不同，拼音语言没有字这个东西。

当然，当汉语失去“中”的平衡的时候，它确实会向某一极偏移。比如书法向字意的偏移，新诗取消汉字、标语式地向朗诵（声音）的偏移、功利性实用主义地向意义（例如“文革”对所指的控制）的偏移。

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乃是汉语偏向用的结果。最近一个世纪的汉语，向着实用偏移。当代汉语呈现一种立竿见影、粗陋、标语口号化的风格，这自然成就了现代化，因为技术需要不美的、直截了当的言说方式。普通话可谓这种偏移的典范。

现代化是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基于西方人对未来的虚构和谋划，当然它也基于西方文明。现代化与古老的汉语是完全相悖的。汉语即使到今天已经非常粗鄙实用，但它依然是古代巫师使用的那种语言，许多字可以在甲骨文上找到。现代化就是祛魅，就是标准化、量化、同质化，把世界变成可以用一个通行标准、一种度来衡量，精细化、指标化的东西。汉语的模糊、朦胧、魅力、不确定、太极图式的语法变化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的。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现代文明是一种“除魅”，也就是把古代社会中的巫术、迷思、诗意去除，让世界主流朝向科学、契约、技术、经济这些必须清楚、准确、明白的方面。

184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激进者提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消灭“万恶之源”汉语。鲁迅就曾经说“汉语不亡，中国必亡”。但是一百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未完，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现代化，汉语并没有